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当议

王彩萍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从文学研究角度观照浙江地域文化精神,认为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是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浙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浙江;地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 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 71 - 2250 (2009) 04 - 0005 - 0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对人的塑造之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地域文化对浙江经济崛起的影响作用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也泰列浙江地域文化研究中,但更切近的出发点是要探讨浙江地域文化对浙江新时期作家的影响,所以本文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观照浙江地域文化。

1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本是中国传统思想取向,但是浙江表现得尤其鲜明突出。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中的表现就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注重实事实功,不做高蹈空虚之论。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我们理解浙江文化精神的关键所在。这种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原型大禹的传说中孕育,流贯于浙江自古以来的学术文化精脉,也体现在浙江的当代实践中。

大禹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名君。大禹的出生地、埋葬地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在当今旅游资源直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的形势下,各地对大禹的争夺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浙江地域文化与大禹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所有对大禹争夺的地域省份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浙江这样深切地体现大禹的精神。在浙江与大禹的联系中,正统的说法是大禹乃越人(也就是浙江人)的始祖,越人是禹的苗裔^①;另一种说法是大禹乃越人的神话传说人物^②。在这两种说法中,无论哪种说法都点明了大禹在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原型的意义,说明了越人对大禹的认同和大禹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大禹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摒弃空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为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庄子·天下》中借墨子之口对大禹有这样的评价:“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并且进一步阐述墨家为“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践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现代浙江人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大禹的描述是“卓苦勤劳之风”,在小说《理水》中更是用刀刻般的笔触画出了大禹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魂。大禹的卓苦勤劳之风已经成为越人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它脚踏实地拒绝虚飘的民风民性。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自北至南发生着笼罩性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是一种重要思想取向,但是它是由“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功夫推导出的外王之路,与内圣相互制衡,而且在儒家文化的道统中,有一个心性之学逐渐加强,内圣功夫逐渐强于外王之路的趋势。但是在浙江这块土地上,从汉代开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与主流儒家道统相对的强调实学、强调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流脉,它作为主流儒家思想的反思者而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

这条学术流脉主要贯穿在浙东学派中，浙东学派独标一格始自东汉王充。在东汉饿纬之学盛行，士人大多以“习经证经”、“不知难问”的态度求学，唯经典、圣人之言是从的社会氛围中，王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循着“博通众流百家”，“以子证经”和跳出书本、跳出圣人之言，从生活实践、自然万物的实地观察中获得对于经典的验证和对于世界的理解两条理路实现了对当时的学术主流北学的超越，为后来的浙江学人奠定了“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和“实学”的精神宗旨^①。王充之后，浙东学人以自己的生命心血灌注了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长河，在浙东学术文化生命长河的赓续中，虽然各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有所变化，但是其中贯穿着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却是一脉相承。儒学发展到宋明，程朱理学成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程、朱、陆学席卷全国的情况之下，独独在浙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儒家进一步进入心性这样一个内圣的窄胡同，浙江形成了事功学派，而且这种学术风气不限于一地，而是广布于浙东沿海，形成了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婴学，它们虽然地处不同，观点各异，但是体现了共同的学术精神，即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讲求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②明代浙东人王阳明开创心学，在程朱理学之外别立新宗，似乎更加走向了一种心性之学，但是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把程朱理学外在于人的“天理”收归人的本心，显现了强烈的主体精神，它打破了程朱理学对人的头脑的禁锢，为实现实功实效之学准备了主体性条件。明清之际，浙东大儒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一派，浙东史学有其明确的“经世致用”目标，强调学人要从历史演绎中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一个地方的学术走向与理路是其民风民性的精华表达，是一个地方的精魂之凝聚，从浙东学派的传承我们看到了浙江地域文化中深藏着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浙江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沉潜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直接作用于当代，使浙江创造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飞速发展，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是在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支配下抓住了发展经济这个总目标，发挥浙江人的聪明才智用足政策用好政策，发扬禹墨的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取得的。浙江现象、浙江精神，归根结底，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产生的现实硕果，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2 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还有一种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这种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产生自浙江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这种精神一方而使浙江人敢打硬仗，能够认准目标坚韧不拔，另一方而也塑造了浙江人嫉恶如仇、公正廉明，按照原则办事的风格。

一个地域的原初地理环境对一个地域的民风民性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这已是被人类学研究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浙江的地理环境是从浙西的河道纵横、一马平川逐步过渡到浙东的山峦连绵、濒临大海。“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浙江人对自己地理环境引以自豪的表述，海的宽广，山的刚强，山海相连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浙江人珊瑚礁般的硬气，形成了浙江人硬汉精神的最初积淀。

浙江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苦难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记忆也进一步锤炼了浙人的硬汉精神。在浙江历史地理的演变过程中，曾经遭遇到几次海侵，浩瀚的海水淹没了靠海生存的浙人的家园，使得他们不得不几次搬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各种族、民族创世的神话传说中大多有关于洪水淹没家园的记述，这表明了最初的水患给人类心灵上留下的苦难记忆。有了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我们也不难想象浙江历史地理环境的几次海侵带给浙江人的苦难记忆。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争霸，双方经过了 20 年的争斗，因为越人的硬介刚强之气，加重了越人对其中的苦难记忆，勾践的入侍为奴、卧薪尝胆都带有了苦难的气息。而对苦难，浙江人的处置办法是，一是忍受，二是抗争，忍受就是要有千钧系于一发的承受的勇气，抗争就是不服输，坚韧、执着、硬碰硬。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历充分地阐释了浙江人而对苦难时所采取的忍受与抗争的含义。这种硬气渗透在浙江各地的民风之中，鲁迅先生就曾经说柔石的性格中有台州人的硬气^③，宁波人自己说自己的地域民风民性是“石骨铁硬”，人们解释绍兴的师爷传统有“刀笔吏”一说，也说明了其中所包含的硬气。

浙江人的刚强的硬汉精神也决定了其不苟且不阿谀的耿介的一面，决定了其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按原则办事的精神。浙江历史上刚直不阿的人物代有传人，这不仅是浙江的骄傲，也光耀了中国历史。魏晋时期的槽康耿介清峻，而对权要钟会的拜访，他可以一言不发，照样赤臂打铁，等到钟会忍无可忍离去时，他会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平静、冷漠，但是其

中包含了一种内在人格的钢和骨。明初台州的方孝孺情形更为峻烈，燕王朱棣篡位，要他草拟诏书诏告天下，方孝孺疾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开创了亘古未有的“灭十族”的历史记录。明末，宰相马士英欲逃往浙江躲避，浙江学者王思任给马士英的信中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①可谓掷地有声。翻阅关于浙江的一些史料，会看到历史上浙地出生的官员大多具有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官声^②。当代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得益于浙江人对国家政策的用好用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用足政策，显示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融合。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在浙江生活的外省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浙江社会管理与运行过程中的规范与原则。

3 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

浙江文化精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有着一种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这种人文内蕴一方面与江南之地的山川地理物候环境相互生发，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江南的人文荟萃，并将对浙江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世界人文地理方面，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区域文化中的南北之别，1800年法国文学史论家斯达尔夫人就认为：“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1865年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表现这种想象力最完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③在中国，地域文化观念的萌生，南北文化的区别应该是非常古老的，《礼记·中庸》中就记载孔子的话说：“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一直到当代，人们在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特质时还在说：“中国文化向来有南北之分，即北方是实用的、政治的、道德的，而南方则是飘逸的、艺术的，审美的。加这些阐述说明了南北之别以及山川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人的气质乃至文学、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浙江地处江南之地，江南是中国地理环境中最诱发人的情思与无限想象的地方，江南山清水秀的自然地理环境激发了地域文化的灵秀之气，催生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一种温润飘逸灵秀的文人氣息，有人用“亦剑亦箫”这样富有诗意的字眼来概括包括浙江在内的吴越文化的特质，可谓抓住了江南文化的神韵。

当然地理环境的生发对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的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的形成只是一个方面，这种人文内蕴的形成更大程度上得自于人文的荟萃。历史上经过几次北人南迁，使得江浙汇聚了越来越发达的人文之气。《汉书·地理志》中尚有“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的记载，说明直到汉代，吴越之地还是蛮荒之地，民风强悍。汉武帝时，在政府主持下，一批北人南迁，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汉武帝也强迫一些豪门大族南迁，为江浙一带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内蕴。随后，东汉至南宋，北方世族经过了三次大的南迁，为江浙一带带来了丰厚的人文底蕴，根据学者的考证，“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中心已趋向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江南。换言之，也就是从开封、洛阳的东西向轴心，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南宋首都临安，现在的杭州，又是江南的核心。”^④这种人文汇聚，使得明清时期的江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重镇，是中国藏书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成为了中国文人氣息最为浓厚的地区。江浙地区的这种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精粹的脉息，成为考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实证之地，也必为未来的浙江发展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

同一观察对象因观察角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我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去观察浙江地域文化精神时，我们发现上述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对新时期浙江作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路向，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等等，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对之作详细的论述。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②1920年代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大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当代浙江学

者陈桥骄也延续了这个观点，参见陈桥骄《关于禹的传说及后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

③参见徐斌：《土充：浙东学派的奠基人一兼论“事实判断”思维的源流》，《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讨会论文集》，第110-119页。

④黄宗羲：《宋元学案·良斋学案》⑤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经言及。

⑥如宁波天一阁馆馆长虞浩旭编著的《智者之香》一书中，讲述到很多宁波藏书家历史上记载都是廉洁清明。

⑦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⑧月一纳：《艺术析学》，傅需译，）‘一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⑨刘士林：《人文江南关键词》，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⑩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页。